

从近年出土新材料看楚国 早期中心区域

笄浩波（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研究馆员）

近十年来,随着一些配合大型基本建设项目工程考古工作的开展,新的考古材料层出不穷,打击文物犯罪行为收缴的出土文物也不少,拍卖市场的公开化更使一些精品文物见诸于世。但由于这些材料或出土不连续或披露很零散,并未有学者将其进行综合考察。本文对其中一些材料加以梳理,试图从中寻找楚国早期中心区域的新线索。

本文所指楚国是指熊绎受周成王所封建立的楚国,中心区域主要是指春秋以前楚国早期活动的区域。

一 从鄂国地望看楚国早期中心区域

早期楚国与他国开始发生关系最早的记载是熊渠征伐之事。《史记·楚世家》载:“熊渠生子三人。当周夷王之时,王室微,诸侯或不朝,相伐。熊渠甚得江汉间民和,乃兴兵伐庸、杨粤,至于鄂。熊渠曰:‘我蛮夷也,不与中国之号谥。’乃立其长子康为句亶王,中子红为鄂王,少子执疵为越章王,皆在江上楚蛮之地。及周厉王之时,暴虐,熊渠畏其伐楚,亦去其王。”《竹书纪年》有类似记载。庸的位置较明确为湖北竹山县一带,裴骃《集解》引杜预注:“庸,今上庸县。”《正义》引《括地志》云:“房州竹山县,

本汉上庸县,古之庸国,昔周武王伐纣,庸蛮在焉。”“杨粤”据学者考证,为杨水流域的粤人^[1],属百越的一支,粤通越。《水经·沔水注》:“杨水又北径竟陵县西,又北,纳巾吐柘。柘水,即下杨水也……巾水又西径竟陵县北,西径杨水,谓之巾口,水西有古竟陵大城,古郢国也。”说明杨粤地近郢国,在江汉之间。鄂的位置则有西鄂和东鄂说,关于这两说的来源,李学勤先生在其《论周初的鄂国》(《中华文史论丛》2008年第4期)一文中有详介,在此不赘述。若以汉水为界,我们可以将其归为南、北两说,这两说孰是孰非则是确定楚国早期中心区域的关键。

近年的出土材料给我们提供了确定鄂国地望的线索。2007年,考古工作者对随州安居羊子山M4进行抢救性发掘,出土青铜器27件,器类有圆鼎、方鼎、簋、方彝、罍、尊、卣、鬲、爵、觥、盘、盃、甗等。除少量还在修复外,大多数都已展出,并收入《随州出土文物精粹》(文物出版社,2009年)。其中方彝上有“鄂侯作厥宝尊彝”铭文,罍、盘、提梁卣上有“鄂侯作旅彝”铭文。《精粹》认为这批铜器的年代为西周早期。李学勤先生将其年代进一步定在康昭时期,并联系1975年在同一地点发现的西周早期的鄂侯弟季尊以及上海博物馆藏的3件鄂器

中的两件可能出自湖北,认定羊子山为鄂国公室墓地^[2]。此论甚是,我们可以进一步说,至少西周早期的鄂国应该在随州安居一带。这个观点是否与学界普遍认为西周时的曾(随)在随州安居一带的观点相矛盾呢?其实不然,我们并没有说整个西周时期鄂都在随州安居,学界也并没有明确曾(随)是何时迁到随州安居的。目前随州安居一带出土的曾器时代均不早于西周晚期,这似乎暗示西周晚期之前的曾国也许不在随州安居一带。笔者认为曾迁到随州安居早不过西周晚期。

近年的考古发掘似乎印证了这一暗示,2011年5~6月,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对随州淅河镇蒋寨村叶家山墓地进行了发掘,已发掘墓葬65座,出土300多件青铜器,多件有铭文。其中M2出土的多件铜器铭文有“𡵓侯谏”的称名,另M27等多座墓中都出有“𡵓侯”字样的铜器^[3]。该“𡵓”既与殷墟卜辞中记载的“𡵓”^[4]写法相同,也与“安州六器”及“静方鼎”铭之“𡵓”一样,彼此的方位及时间都能对上,它们应该同指一国,则此地应为卜辞和以上两器铭所指𡵓国的𡵓侯公室墓地。在叶家山墓地周围又发现了9处商周时期的大型聚落遗址,其中,以已知的庙台子遗址最大,面积达30万平方米,地面调查和局部勘探显示,该遗址有城墙、壕沟和大型建筑基址等遗迹,应当是一座商代晚期至西周早期的古城。叶家山墓地与庙台子遗址相距不足1公里,推测叶家山墓地的主人当与庙台子遗址有关,庙台子遗址或可认为就是此𡵓国都城之所在^[5]。该墓地的发现也表明商代后期至西周早期,该𡵓国的中心应在随州东北部的淅河蒋寨村附近,邻近同时期的鄂国。2002年,为配合孝襄高速公路的建设,襄樊市考古队对枣阳吴店东赵湖郭家庙一处墓地进行了发掘,共清理墓葬29座,其中GM21为一带墓道的重棺一椁墓。由于遭到破坏,墓口大小不详,墓底东西长6.56、南北宽4.12米。墓中被盗严重,虽然铜礼器不存,但仍出铜器2085件,其中尤为重要的是出土了1

件带铭文的铜钺,铭文云:“曾伯琦铸威钺,用为民,刑非歴毆刑,用为民政。”^[6]按周代铭文称名的特点,这应该是曾伯的权钺,这位曾伯应为曾国的一位公室成员。从钺的形制看,为倒“T”形,是钺的一种较早的形制。由于墓中无可断代的铜礼器,只能从传世的另一件曾伯琦壶来推断该墓的年代。曾伯琦壶的年代为西周中晚期^[7],两器的器主为同一人,则此墓的年代也应为西周中晚期。该墓地还出有“曾孟羸铜”簠、壶各1件,“曾亘嫚非录”鼎2件等。这些器物都应该是他国嫁女曾国公室的陪嫁器物。1982年,在其附近的东赵湖采集的1件春秋时期铭文为“曾侯緡伯”的戈^[8]也应出自该墓地。从墓地规模、墓葬形制及随葬器物特征看,该墓地应为西周晚期至春秋早期的另一个曾国公室墓地应无疑义。在距该墓地东侧不远的周台发现一处大型聚落遗址,地层堆积主要是周代文化遗存,起始年代为西周晚期,尤为重要的是发现了春秋早期的大型廊式建筑遗存^[9]。据此看,该聚落的等级非同一般,很有可能与墓地存在对应关系,这表明西周晚期的曾国中心应在枣阳吴店镇附近。这两处墓地的发现,说明至少在西周晚期之前,无论是𡵓国还是曾国的中心都不在随州安居一带。

𡵓与鄂相近的距离关系在鼎铭中有反映,湖北孝感宋代出土的中甗著录于薛尚功《历代钟鼎彝器款识法帖》,今收入《殷周金文集成》949,其铭文云:“王命中先省南国,贯行设居,在𡵓,史儿至,以王命曰:‘余命汝使小大邦……’中省自方、邓,舟(造)□邦,在鄂师次,伯买父□,以厥人戍汉中州,曰段曰旒……”。这是说昭王命中在南巡时先行,到达了𡵓,又受命出使周围大小诸侯,返抵鄂驻军,遣人戍守汉水中间两处土地。这里提到𡵓,也提到鄂。现藏日本出光美术馆的静方鼎,今收入《近出殷周金文集成》357,其铭文也记载昭王命中和静省南国,设居,静返回成周报告,“王在成周太室,命静曰:‘俾汝司在𡵓鄂师。’”这里又说到𡵓和鄂^[10]。中甗和静方鼎铭文中都

记录昭王南巡之事,其中都涉及豳和鄂,静方鼎更是将豳、鄂连提,说明两国相距不远。这与考古发现可以相互印证。

那么,曾是何时迁到鄂国故地的呢?笔者认为这和鄂侯驭方率南淮夷反周之事有关,该事件在禹鼎中有详细记载:“亦唯鄂侯驭方率南淮夷、东夷广伐南国、东国,至于历寒。王乃命西六师、殷八师曰:‘裂伐鄂侯驭方,无遗寿幼。’……雩禹以武公徒御至于鄂,敦伐鄂,休获厥君驭方……”此次伐鄂以俘获鄂侯驭方而结束。按周王的指令,鄂侯公室应该就此绝祀,鄂国被灭。其邻国豳为南淮夷,很可能也参与了此次反叛,因受牵连,故也遭灭族之灾。但鄂国遗民并未被杀尽,就如同周灭殷后将殷遗民迁于成周一样,鄂国遗民也许被周王迁于他处,很可能就是后来的东鄂。同样,豳国遗民也可能被迁往了他处。然后周王将同为姬姓的随迁来管理原豳、鄂两国之地以控制这一重要地域。禹鼎的年代有夷王^[11]、厉王^[12]、孝王^[13]说,无论哪一说为是,可以肯定的是,豳和鄂国被灭应是西周中期以后的事情。换句话说,随控制豳、鄂故地的时间也是西周中期以后。随沿用了豳的国名,为了以示区别,在豳下加一口(后改为日),改称曾国。但周人仍对曾称随,所以文献中见随不见曾,而随人自己则称曾。曾国的铜器皆出现于西周中晚期后,而豳国的铜器其后却消失不见。豳与曾的关系因与本文无关,在此不详论。

西周中期以前的鄂是否一直在今随州安居呢?这就要看此前鄂与周王室关系如何了。从目前发现的西周鄂器看,形制基本同周制,如羊子山 M4 的尊、卣形似昭王时期的趯尊、趯卣,盘似康昭时的伯矩盘、父辛盃^[14];上博藏鄂叔簋形制同于武王时期的大丰簋,鄂季奎父簋形制同于成王时期的禽簋。这说明西周早期,鄂与周文化具有一致性^[15]。另从鼎铭也可以窥其一斑,一为《三代吉金文存》中所收传世的穆王时的“鄂侯作王姑媢”簋,鼎铭:“鄂侯乍王姑媢簋,王姑其万年子子孙孙永宝。”^[16]鄂为姑姓,该器乃鄂侯嫁女与周穆王时所作陪嫁之

器,这说明鄂侯与穆王有联姻关系。另一为“鄂侯驭方”鼎。该鼎是鄂侯驭方为自己所铸,鼎铭记载了鄂侯驭方在坏覲见南征伐角、橘后回师的周王,向周王纳献,与周王同宴、会射,并得周王赏赐玉、马、矢等物,为感谢天子恩德,而作鼎铭。“鄂侯驭方”鼎的时代有夷王^[17]、厉王^[18]、穆王^[19]等说。无论是何王时器,至少说明一点,西周中期,鄂国与周王室是交好的。从以上实例来看,西周中期以前,鄂与周的关系一直很亲密,也即鄂国在夷厉之前不会主动有大的迁徙行为。那么,鄂国会不会在周成王分封诸侯的时候迁到了南阳之鄂呢?笔者认为不大可能,因为鄂侯在商纣王时能位至三公,不是个大国也是一个强国,周王绝不会将一个可能对自己构成威胁的国家迁到畿内,在自己身边埋炸弹,对鄂可能是就地分封。相反,商纣王将为九侯进言的鄂侯脯了后,将原在南阳的鄂赶到了随州安居一带倒是有可能,更可能是鄂国为了避祸自己迁到随州安居的。上引殷墟卜辞中记载武丁南伐时南方有豳配合,却未见有鄂,这也许暗示当时鄂并不与豳临近,也即商代晚期以前的鄂可能不在随州安居一带,而在南阳以西。这也许是南阳存在西鄂的原因吧。由此,我们可以确定,西周初期至西周中期,鄂国都在今随州安居一带。现在看来,对鄂侯为何会在坏地覲见周王这一事件可以解释清了,因为鄂侯驭方从随州安居之鄂去淮域的坏地实际上是很便利的事情。同样对鄂侯率南淮夷反周这一事件也可以说得通,因为当时的鄂本身就是一大国,且得周王青睐,具有一定的号召力,何况随州距南淮夷本就很近,鄂侯能将他们联合起来应该是很容易的事情。将“鄂侯驭方”鼎与禹鼎鼎铭所载事件的当事人及发生时间联系起来看,两件器物中的鄂侯驭方应指同一个人,只是“鄂侯驭方”鼎应早于禹鼎,也即两器皆应为夷、厉时器。

那么,楚人所伐之鄂在哪里?熊渠至鄂时当夷王时期,依《史记》所言,熊渠在鄂立中子红为鄂王一事足以表明楚人已占有鄂地。这样,楚人占鄂的时间与周人灭鄂的时间几乎同

时。这显然不符合逻辑。楚国占领鄂地时王室已微,周人灭鄂时王室仍强。由此推导,周人灭鄂应在先,楚国占领鄂地而后,这才与当时的时代背景相符。这样,“鄂侯驭方”鼎与禹鼎可以明确为夷王时之器,也即鄂国灭于夷王时期。那么,楚人占领的鄂会不会是南阳之鄂?笔者认为不可能,周人能将强大的鄂从南阳逼到随州,说明南阳作为入周腹地的通道对周人很重要,一定会派重兵把守,周人封申、吕、息、唐在此就是明证。依当时楚人的势力还不能与周人相争,即使是王室微,周人也不会轻易让楚人侵入畿内,对周构成威胁。熊渠在厉王时惧而去王号也说明楚人势力弱小,还不敢公然反周,再说楚若去打南阳之鄂还得经过东边的邓国,到南阳盆地还得骚扰到申、吕、息、唐等国,凭当时楚人的实力还无法与这几个国家抗衡。楚国占领的是否是鄂国旧地——随州安居?笔者认为这个可能性是有的,因为周人灭幽、鄂后不可能对此要地弃之不顾,很有可能让其同姓的随(曾)封于此地继续控制该地域,但随(曾)国当时的中心在枣阳,其势力发展到随州的鄂还有一个过程。值此时,周室势微,诸侯并起,熊渠方强,故趁机打了个时间差,向东发展,占领了鄂旧地。但这里有个问题,按熊渠东侵随州之鄂的路线看,必经其东边的罗、卢戎之地,熊渠不先攻打罗、卢戎,却跨过他们去打远在汉水东边的鄂,似乎讲不通。本人更倾向于楚所占鄂为东鄂,即今长江边的某个地方。鄂人此时势微,又是新迁他地,尚未站稳脚跟,遇到日益强盛的楚人自是难保。若此,楚应该距东鄂较近才能较容易打到东鄂。从司马氏所言“熊渠甚得江汉间民和”看,楚国也应该距江汉间较近。若楚国在丹浙之会,虽然距江汉之间不算太远,但要到随州的鄂或长江边的鄂,得长途奔波,还得防止麇、罗、卢戎、邓、随(曾)等国的阻扰,这在交通并不发达的西周时期是一件既耗废人力、物力又耗费时间的东西,凭楚国当时的实力去进行如此大规模的军事行动还是有一定的难度,更何况近期意义不大。从以上分析看,楚国此时应该在汉水以南,才

能做出“伐庸、杨粤至于鄂”之事。依上所考,楚国应该在江汉地域以西或西北,才与“伐庸、杨粤至鄂”的路线相符。

二 从濮之地望看早期楚国中心区域

早期楚国与周边诸族中的濮发生关系较多,《史记·楚世家》:“熊霜六年,卒,三弟争立。仲雪死;叔堪亡,避难于濮;而少弟季徇立,是为熊徇。”濮显然离楚国较近,跟楚还有一定的关系,不然,叔堪是不会选择避难于濮的。《国语·郑语》:“及平王末,而秦、晋、齐、楚代兴、秦景、襄于是乎取周土,晋文侯于是乎定天子,齐庄、僖于是乎小伯,楚蚡冒于是乎始启濮。”蚡冒时,“楚地不过同”。因为濮离楚最近,所以楚国势力方强,首先讨伐的就是濮。濮为助周灭商的八族之一,为周初一强族,与周人腹地毗邻,《左传》昭公九年记周使詹桓伯在述及周初的疆域范围时说:“及武王克商,蒲姑、商奄,吾东土也。巴、濮、楚、邓,吾南土也。”詹桓伯的话一方面表明濮在周人眼里很强大,另一方面也表明濮与楚确实很近。关于濮的地望还有一则文献与之有关,《左传》文公十六年:“(前611年)楚大饥,戎伐其西南,至于阜山,师于大林。又伐其东南,至于阳丘,以侵訾枝。庸人帅群蛮以叛楚。麇人率百濮聚于选,将伐楚。”从这段记载看,庸非为群蛮之首,也与群蛮相近;同样,麇非为百濮之王,也与百濮相近。确定了麇地,也就框定了濮地。

麇在《左传》中共五见,三次作国名,两次为地名,皆书为“麇”。麇与楚发生关系较多,《左传》文公十年载:“(前617年)陈侯、郑伯会楚子于息。冬,遂及蔡侯次于厥貉,将以伐宋,……厥貉之会,麇子逃归。”麇为楚国附庸,麇子从楚穆王参与厥貉之会,因不满于楚人凌小国,不待会终而归,因此,次年即遭到楚人的讨伐。文献中记载麇的国都在钐穴,《左传》文公十一年:“十一年春(前616年),楚子伐麇。成大心败麇师于防渚。潘崇复伐麇,至于钐穴。”杜注:“钐穴,麇地。”找到钐穴,就找到了麇地的地望。从文献记载看,钐穴

在湖北郧县境内,《汉书·地理志》汉中郡钫县下原注云:“应劭曰‘音阳’,师古曰:‘即春秋时所谓钫穴。’”说明两汉时,麇属汉中郡阳县。又《水经·沔水注》:“汉水又东,径魏兴郡之钫县故城北,为白石滩县,故春秋之钫穴也。故属汉水(引者注:水为衍字)中,王莽之钫治也。”说明魏晋时期属魏兴郡白石滩县。《元和郡县图志》卷二十一“均州”下,记有更为明确的解说。均州“郧乡县”条说:“本汉钫县,古麇国之地也。《左传》曰潘崇伐麇‘至于钫穴’是也,汉钫县属汉中郡,晋武帝改钫县为郧乡县,隋初属均州。”清顾栋高《春秋大事表·春秋列国都邑》:“麇都钫穴,今为湖广郧阳府治郧县,文十一年潘崇伐麇至散穴。杜注:‘麇地。’盖即麇之国都,钫音阳。”又清《郧县志》:“钫穴在县西一百二十里,东临汉水,北瞻天河,在长利废丘东。”《大清一统志》谓钫穴在白河县东,顾祖禹《读史方輿纪要》谓钫穴在郧县西北。以上历代诸说说不一,但方位一致,即麇国在陕西白河至湖北郧县之间。

考古材料证明,顾祖禹所言极是。2006年3~12月,为配合南水北调中线工程,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对郧县五峰乡肖家河村的乔家院墓地进行了勘探和发掘,其中4座春秋时期墓葬不仅出土了一批青铜礼器,而且还在少量兵器上发现了铭文,除部分铭文不太清楚尚待进一步考释外,其中较为重要的是在M4所出铜戈上的“惕(钫)子斯之用”铭文^[20],按金文称名惯例,其中的“斯”当为兵器的主人名,“惕”应为国属,子为爵称。M4为方形坑,原墓口已被破坏,有无墓道不清,墓底边长5.05米,虽然被盗,仍出土随葬器物30多件,墓内还殉葬一人^[21]。从出土器物形制看,时代为春秋中期晚段。因该墓早年可能被盗过,无法从随葬器物来推断其身份等级,但是从墓的大小及规格看,墓主人的身份等级不会低。从春秋时期几个小诸侯国的墓葬看,规模差不多。如1978年发掘的信阳平桥春秋早中期的樊国国君墓,墓底长4.9、宽3.3米,规模不及M4^[22]。又如1983年发掘的河南光山县春秋早中期的黄君孟

夫妇墓,墓口长7.9、宽12.2米。因为是夫妇合葬,故稍大,若将其分成两墓也不及M4^[23]。由此,我们推断,M4应为惕国国君或其后代的墓。无独有偶,2001年郧县博物馆曾在此地发掘过一座残墓,其中的铜盘、铜匜和铜钺上皆有“惕子中颺儿”或“惕子中颺”的铭文^[24],其国属及爵称同于M4,只是人名不一样。同一国属的器物出于同地不同的墓中,只有一种可能,此墓地应是惕国公室墓地。这与文献中的随是考古发现的曾一样,惕通惕,很有可能是文献中的麇国,惕子斯很有可能就是其国君,一国两名。若此,则麇国的地望已明,在今湖北郧县五峰乡一带,与文献所记相符。既然麇国的地望已明,那么濮的地望也就清楚了,应也在汉水中上游。何浩先生在《楚国灭国研究》中指出“百濮散居于武当山及其以南的山岭中”是极有见地的。依詹桓伯言,楚在濮、邓之间,学界多认为邓在今湖北襄樊以北的邓城^[25],此则进一步可证楚国应在汉水所经的郧县至襄樊之间。

三 从出土文献看早期楚国中心区域

近年的出土文献中也可以找到楚国早期中心区域的相关信息。1994年,河南新蔡葛陵战国中期的一座楚墓出土了一批竹简^[26],其中有些简文谈到了楚人早期的居地。如新蔡简甲三11、甲三24:“昔我先出自郢道,宅兹沔(沮)、章(漳),以选迁处”。关于宅兹的意思,董珊先生有专论:金文中经常有“宅xx”或“宅兹xx”的辞例,如晋公盆铭文:“王命唐公,宅京师,有晋邦”(《殷周金文集成》10342,以下凡引此书著录号,都略去书名);何尊:“初迁宅于成周……宅兹中或(国),自之又民”(06014);秦公簋:“甯(宐)宅禹责(蹟)”(04315);九里墩鼓座:“余以宅东土,至于淮之上”(00429)。文献中也有楚人自言宅的,如《左传》昭公十二年记载楚灵王语:“昔我皇祖伯父昆吾,旧许是宅。”在这些铭辞及文献中,“宅”字下所接地点都是讲都邑所在的范围^[27]。依此解释简文的意思是:楚人的先祖为颛顼之后,选择了在沮、漳

二水之间定都。关于楚人先祖,楚简中多有提及,将《望山楚简》^[28]、《包山楚简》^[29]、《新蔡葛陵楚墓》^[30]等简文中楚人祭祀的祖先名加以归纳应该为老僮、祝融、鬻熊。老僮、祝融为楚之远祖,鬻熊为楚人近祖。老僮之居在骊山,《山海经·西山经》:“又西一百九十里,曰骊山,其上多玉而无石,神耆童居之。”郭璞注:“耆童,老童,颛顼之子。”祝融之居在新郑,《左传》昭公十七年载:“郑,祝融之虚也,皆火房也。”排除以上二位楚先,居住在沮、漳的只能是楚人近祖鬻熊。文献中楚人的活动也多与沮、漳二水有关,《墨子·非攻下》载“昔者楚熊丽始(讨)此睢山之间”,即熊丽在沮水荆山之间治理国家。《左传》哀公六年记载有关楚王祭祀之事:“楚昭王有疾,卜曰‘河为祟’。王弗祭。大夫请祭诸郊,王曰‘三代命祀,祭不越望。江、汉、睢、章,楚之望也。’”意思是楚国的祭祀范围在江、汉、沮、漳四水之间。又同年《左传》记昭王因吴师入郢而逃跑的路线:“楚子涉睢济江,入于云中。”新蔡楚简中也提到了楚人祭祀之事,新蔡简甲三 268 号残简:“及江、滩(汉)、涎(沮)、漳,(遂)至于濠(淮)。是日就祷楚先:老[僮]、祝[融]”^[31],说的也是楚人祭祀的地望,与文献相印证。楚人的话语中多次提到沮、漳二水,说明沮、漳二水在楚国人的心目中很神圣,由此推断,楚国的中心区域距沮、漳二水一定很近。

荆山也在楚人口中常提,如《左传》昭公十二年载楚右尹子革追忆先祖语:“昔我先王熊绎,辟在荆山。筦路蓝缕,以处草莽,跋涉山林,以事天子。”《史记·楚世家》也有同样的记载。而在出土文献中,荆山一词也出现了,2008年,清华大学获得了一批重要的楚简,其中有一篇《楚居》^[32],其记载方式同于《世本·居篇》,记载了从楚先祖季连至楚悼王时期楚宗族居住过的地方。《楚居》:“季连……先尻(处)于京宗。穴禽(穴熊)迟徙于京宗,爰得妣房(厉),逆流哉(载)水,毕(厥)状聂耳,乃妻之,生佗叔、丽季。……至禽狂亦居京宗。至禽绎与屈紃,思(使)都嗑卜徙于夷屯(夷陵,即丹阳),为梗(便)室(据说是楚人用于祭祀的场所),室既

成,无以内之,乃窃都人之橐以祭。……至禽只、禽觚、禽樊及禽锡、禽渠,尽居夷屯。禽渠徙居发渐。至禽钥(艾)、禽挚居发渐。禽挚徙居旁岢。至禽延自旁岢徙居乔多。至禽甬(勇)及禽严、禽相(霜)及禽雪及禽训(徇)、禽骂及若器(敖)禽义(仪),皆居乔多。若器(敖)禽义(仪)徙居箬(都)。至焚(蚡)冒禽帅自箬(都)徙居焚。至宵器(敖)禽鹿自焚徙居宵。”从《楚居》看,简文中明确记载楚先季连最后居京宗,穴熊至于熊绎也都居住在京宗。京通荆,京宗即荆山之首。穴熊应为楚简及文献中常见的鬻熊。从文献及竹简的对照看,楚国早期中心区域与荆山及沮、漳二水有着密切的联系。

沮、漳二水皆发源于荆山,如《山海经·中次八经》:“荆山之首,曰景山。……睢(沮)水出焉,东南流注于江,……东北百里曰荆山。……漳水出焉,而东南流注于睢。”又《水经·沮水注》云:“沮水出东汶阳郡沮水县西北景山,即荆山首也。”两者所记相同。看来,沮、漳二水与荆山的关系已经很清楚了。关于荆山,除上引有沮、漳二水的荆山外,《山海经》上还记载有一处荆山,《山海经·中次十一经》:“荆山之首,曰翼望之山。湍水出焉,东流注于济;颍水出焉,东南流注于汉。”关于此荆山之地望,前人考证甚详^[33],但此荆山无沮、漳二水。石泉先生查阅文献后,共列有五处荆山,即陕西商县荆山、河南淅川荆山、湖北南漳县西北将军石、南漳县南今荆山、安徽怀远县荆山^[34]。刘士莪、黄尚明先生又找到了富平荆山^[35]。怀远荆山和富平荆山与楚国的早期活动区相距太远,故在此不论。前四处荆山则与楚国早期的活动区域相近,都有可能是楚国早期的中心区域。因南漳县南、北实际都属今荆山的范围,故实际上只有三处荆山。以往推断楚人的早期居地是将荆山与丹阳联系起来考虑的,但现在出土的楚简特别是记载楚人居地的《楚居》中却只字未提丹阳。看来,以往将丹阳作为探索楚都的重要依据需重新进行思考。我们今天再来探寻楚国早期都城问题时必须突破传统的思维方式,不要再受丹阳问题的困扰,应该重新寻找依据。

笔者认为楚简中提到的荆山与沮、漳二水才是探寻楚国早期中心区域的关键依据,依此考察以上三处荆山,陕西商县荆山及河南淅川荆山虽然有荆山,但都无沮、漳二水,故可排除,与文献中所记荆山和沮、漳二水的位置及水系情形相符的只有今天湖北西北部的大荆山和发源于该山的沮、漳二水。看来,楚国早期中心区域只能在江汉平原西北部的大荆山范围之内。现荆山之首叫聚龙山,位于沮、漳水之间,属湖北省保康县境,与《楚居》及新蔡简所记相符。《楚居》所言楚季连后期“先处于京宗”及“穴熊迟徙于京宗”的“京宗”应该就是指的金保康聚龙山一带。

在《楚居》的简文中还有三个地名与早期楚国的中心区域有关,一个是厉、一个是夷屯、一个是郢。简文中的厉指的是西周时期的小诸侯国厉国,穴熊在水中偶遇并娶为妻的厉女应该是厉国的女子。文献记载中有三个厉国,一为烈山氏后裔所建,徐少华先生对该厉国的历史地理有详考,认为古厉国在随州东北殷店一带^[36]。何浩先生也有同样的观点^[37]。此外,文献中还有两个厉国,河南鹿邑之厉和息县之厉(赖),此二厉在淮水上游的豫东。前已证楚人早期中心区域在湖北西北的汉水流域,此二厉距楚国早期中心区域实在太远,穴(鬻)熊绝不可能从汉水边跑到几百公里以外的淮水上去泛舟,此二厉的女子也不可能翻山越岭跑到汉水流域来游玩。由此推断,穴(鬻)熊偶遇“逆流哉(载)水”的厉女应该是随州之厉国的女子,此水则很有可能指的就是汉水。这也反证了穴(鬻)熊时期活动区域在湖北西北部的荆山。《楚居》记载穴(鬻)熊至熊绎初期都居住在荆山之首,熊绎时迁居夷屯。夷屯显然与夷水有关,夷水在文献记载中有两处,一处为清江,《水经·夷水注》:“夷水出巴郡鱼复县江,夷水即佷山清江也,……昔凛君浮土舟夷水,据扞关而王巴。”一处为蛮水,《水经·沔水注》:“(沔水)又南过宜城县东,夷水出自房陵,东流注之,夷水,蛮水也,桓温父名夷,改曰蛮水。夷水导源中庐县界康狼山,山与荆山相邻。”康狼山

为今襄樊与南漳交界处的七里山^[38],此处有一河流今叫清凉河,东南流至南漳县武安镇附近注入蛮河。夷水(蛮水)可能就是清凉河及其以下的蛮河,与楚国早期中心区域荆山相近的古夷水应该就是清凉河及其以下的蛮河。今蛮河为汉水支流之一,发源于湖北保康县境,流经南漳、宜城,在钟祥胡集附近注入汉水,蛮河上游流经荆山的广大区域。夷屯可能是古夷水(蛮水)边的某个地方,很有可能是武安镇界。熊绎虽然从荆山之首的聚龙山迁到了夷水边居住,但仍在荆山范围之内,所以楚人子革在追述熊绎事迹时仍言“辟在荆山”。这也反证了熊绎时期活动区域仍在湖北西北部的荆山之内。都应该指的是当时的一个小国,文献中记载先秦时期存在有郢国。关于郢国的地望,郭沫若先生通过对郢国铜器的考证,认为西周晚期后应该有上、下两个郢国并存,下都在陕西商密,上都在湖北宜城,为郢之本国^[39]。学界多赞同此观点。徐少华先生经过详细考证,认为至少西周中期以后就有上郢与下郢同存^[40]。《楚居》记载熊绎迁居前让郢人瞿进行了一次占卜,因为祭祀时缺祭品,就去偷了郢人的牛。《楚居》的记载说明楚国与郢国相近,而这次迁夷屯也有可能是朝离郢国更近的地方迁居。不然,熊绎也不会去找郢人占卜并偷郢人的牛进行祭祀。此郢国不可能是商密之郢,商密之郢远在丹江上游,与楚之间还隔着濮、陆浑戎等强族,当时的楚人虽然受封有子男之田。但直到春秋初才启濮地,凭当时的实力,楚人断不可能轻松地跨过如此广大的他族之地去进行一次大规模的迁居。从政治、军事角度看,周人不可能让楚人往自己的腹地迁移,对自己构成威胁;楚人也不愿意去伸头让周人控制。从生存环境看,商密之地并不比荆山的地理环境优越,楚人北迁无甚价值可言。笔者认为此郢应该就是宜城之郢,这也是楚人从山地走向平原的第一步(笔者在几年前曾指出楚人为山地民族^[41],《楚居》中记载楚人无牛也再次印证了楚人早期确为山地民族)。当然,楚人不可能一下子就抛弃山地生活习惯,其适应平原生活还有

一个过程,《楚居》中关于熊渠迁发渐、熊挚迁旁岷、熊延迁乔多的记载正是这一适应过程的反映,至若敖迁居都才完成了楚向平原生活的过渡。从以上分析看,若敖迁居之都应该就是都国旧都——宜城之都。这从西周末期楚所灭的几个小国地望便知,据何浩先生考证,楚大概在熊罻至若敖时灭了姬姓冉国,冉国地望在湖北荆门、钟祥间^[42]。若与若敖迁都事件联系起来,冉国应该灭于若敖迁都后,因为冉近都,若敖占领都后灭冉是顺理成章的事,这也可以补证若敖迁居之都应该就是都国旧都——宜城之都。从夷屯至都的连线看,楚国应该是沿蛮河逐渐向东迁移,也即发渐、旁岷和乔多都应该在蛮河流域沿线。这又一次反证了楚国早期中心区域在湖北荆山至宜城平原一带。

四 从昭王南征史实看早期楚国中心区域

昭王伐楚之事历来是学者考察早期楚国都城丹阳地望的重要依据,而其中的关键问题有二,一为昭王所伐是否为楚?二为昭王是否过了汉水?这两个问题弄清了,楚国早期中心区域也基本可以框定。关于昭王伐楚之事,无论是传世文献还是金文中都有较多记载,但各种记载出入较大,这也可能是因为当时史家在记述昭王南征失败时用语上的讳莫如深和语焉不详所造成的,以致《史记》中也只能以“昭王南巡狩而不返,卒于江上”一笔带过。《竹书纪年》上记载昭王南征之事共有两次,一次是昭王十六年,一次是昭王十九年,并明言昭王讨伐对象为楚荆,南征时渡过了汉水。

关于昭王讨伐对象,除《竹书纪年》外,其他文献如《左传》中记述齐桓公伐楚时认为是楚国,《吕氏春秋》中则言讨伐对象为荆蛮。金文如趯趯簋、鸿叔簋、史墙盘中都指出昭王讨伐对象为楚荆,矢令簋言楚,过伯簋、鼐簋言荆。楚指楚国无疑义,但楚荆、荆是何指,近年出土的竹简中则给了我们答复,湖北荆门包山出土的战国楚简第246:“祷荆王自熊绎以庚武王,五牛、五豕。”^[43]楚人在祭祀祷辞这种很严肃的记事中都自称楚王为荆王(这与《吕氏

春秋》、《韩非子》等文献中对楚的称呼一致),看来,荆即指楚国已经很明确了。楚、荆为同指,则楚荆连在一起应该是复指楚国。依此,昭王讨伐的对象已然,即楚国。

关于昭王南征路线,文献中都缺载。有人从“安州六器”中探寻昭王足迹^[44],但“安州六器”中的中甗、中方鼎、中解等记载的是昭王南征前派中先打前站做准备工作之事,并非是昭王南征的路线。从铭文看,中经过了邓、唐、厉、岫、鄂等汉东诸国,这些国家都未过汉水,但基本都是汉东的强国,且与楚国相近。昭王也许要他们助周伐楚,所以命中去诏告和调遣。前引静方鼎也有类似的记载,铭文中明言静受命统领岫、鄂的军队即为明证。目前,涉汉才是探寻昭王南征路线的关键,关于昭王涉汉记载的较早文献除上引的《竹书纪年》外,还有《吕氏春秋》。其《音初》篇中说:“周昭王亲将征荆,辛余靡长且多力,为王右。还,反涉汉,梁败,王及祭公扈于汉中,辛余靡振王北济,又反振祭公。”另皇甫谧《帝王世纪》虽未言涉汉,但有济汉之语,《帝王世纪》:“昭王德衰,南征,济于汉,船人恶之,以胶船进王,王御船至中流,胶液船解,王及祭公俱没于水中而崩。其右辛游靡长臂且多力,游振得王,周人讳之。”近年出土的铜器铭文中也有昭王涉汉的记载,李学勤先生在其《由新见青铜器看西周早期的鄂、曾、楚》一文中介绍了一件流散青铜器京师峻尊,认为该尊为昭王时期。尊内底有铸铭6行26字:王涉汉伐楚,王又毆(?)工,京师峻日斤工矢釐贝,用乍日庚宝尊彝,册癸^[45]。铭文中不仅明言了昭王南征涉汉,而且指明所伐对象为楚国。这样,昭王南征的对象及涉汉的问题可以盖棺论定了。依此,昭王时期的楚国应该就在汉水以南。昭王时期对应的楚君应该在熊绎至熊渠之间的几位中,依《楚居》所言,至熊渠之时,楚皆在夷屯。由此推导,夷屯也应该在汉水以南,这与上考夷屯的地望不谋而合。

综上所述可证,熊绎至若器(敖)时的楚国中心区域在汉水以南的荆山至宜城一带。

- [1] 何浩《楚灭国研究》，武汉出版社，1989年。
- [2] 李学勤《由新见青铜器看西周早期的鄂、曾、楚》，《文物》2010年第1期。
- [3] 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随州叶家山墓地考古发掘工作获阶段性成果——西周早期曾国史研究将有重大突破》，《江汉考古》2011年第3期。
- [4] 卜辞共有两条，为武丁时期：“乙未[卜]，贞：立事[于]南，右比[我]，中比[與]，左比[齒]”、“乙未[卜]，[贞]：宰立事[于]南，右比[我]，[中]比[與]，左比[齒]，十二月。见《甲骨文合集》第3册，第5504.5512片，中华书局，1978年。
- [5] 武汉大学历史系考古教研室等《西花园与庙台子》，武汉大学出版社，1993年；同[3]。
- [6] 襄樊市考古队等《枣阳郭家庙曾国墓地》，科学出版社，2005年。
- [7] 周永珍《曾国与曾国铜器》，《考古》1980年第5期。
- [8] 田海峰《湖北枣阳县又发现曾国铜器》，《江汉考古》1983年第3期。
- [9] 襄樊市文物考古研究所《枣阳周代遗址发掘报告》，《襄樊考古文集》（第一辑），科学出版社，2007年。
- [10] 同[2]。
- [11] 郭沫若《两周金文辞大系》考108；刘翔《周夷王经营南淮夷及其与鄂之关系》，《江汉考古》1983年第3期。
- [12] 徐中舒《禹鼎的年代及其相关问题》，《考古学报》1959年第3期。
- [13] 唐兰《西周青铜器铭文分代史征》，中华书局，1986年，孝王铜器。
- [14] 同[2]。
- [15] 徐少华《鄂国铜器及其历史地理综考》，《考古与文物》1994年第4期。
- [16] 罗振玉《三代吉金文存》7.45.3-5，中华书局，1983年；另见上徐文所引。
- [17] 郭沫若《两周金文辞大系》（七），科学出版社，1957年。
- [18] 同[12]。
- [19] 同[13]，附件一、穆王时器。
- [20] 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湖北郧县乔家院春秋殉人墓》，《考古》2008年第4期。
- [21] 同[20]。
- [22] 河南省博物馆等《河南信阳市平桥春秋墓发掘简报》，《文物》1981年第1期。
- [23] 河南信阳地区文管会等《春秋早期黄君孟夫妇墓发掘报告》，《考古》1984年第4期。
- [24] 郧县博物馆《湖北郧县肖家河出土春秋楚墓》，《江汉考古》2003年第1期；孙启康《丹江口水库库区出土三起铜器铭文考释——读〈尘封的瑰宝〉甬王、侯之遗踪》，《江汉考古》2008年第1期。
- [25] 石泉《古代荆楚地理新探》之《古邓国邓县考》篇，第105~126页，武汉大学出版社，1988年；何浩《楚灭国研究》，第10页，武汉出版社，1989年。
- [26] 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新蔡葛陵楚墓》，大象出版社，2003年。
- [27] 董珊《新蔡楚简所见“颍项”和“睢漳”》，简帛研究网站，2003年12月7日。
- [28] 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望山楚简》，中华书局，1995年。
- [29] 湖北省荆沙铁路考古队《包山楚简》，文物出版社，1991年。
- [30] 同[26]。
- [31] 同[26]。
- [32] 清华大学出土文献研究与保护中心《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壹）》，中西书局，2010年。
- [33] 石泉《古代荆楚地理新探》之《楚都丹阳及古荆山在丹、浙附近补证》篇，第206~208页，武汉大学出版社，1988年。
- [34] 同[33]，第208~209页。
- [35] 刘士莪、黄尚明《荆山与丹阳》，《楚文化研究论集》（四），河南人民出版社，1994年。
- [36] 徐少华《古厉国历史地理及相关问题》，《江汉论坛》1987年第3期。
- [37] 同[1]。
- [38] 石泉《古代荆楚地理新探》之《古鄢、维、涑水及宜城、中庐、己县故址新探——兼论楚皇城遗址不是楚鄢都、汉宜城县》篇，第302页，武汉大学出版社，1988年。
- [39] 郭沫若《两周金文辞大系》郢国铜器考释部分，科学出版社，1958年。
- [40] 徐少华《郢国铜器及其历史地理研究》，《江汉考古》1987年第3期。
- [41] 笪浩波《由楚文化遗存的分布特点看早期楚文化的中心区域》，《楚文化研究论集》（七），岳麓书社，2007年。
- [42] 同[1]。
- [43] 同[29]。
- [44] 尹盛平《金文昭王南征考略》，《陕西历史博物馆馆刊》第二辑，三秦出版社，1995年。
- [45] 同[2]。

（责任编辑：李媛媛）